



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 Technology-Beijing

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

基于认知失调理论的官员腐败问题研究
——以山西省“塌方式腐败”为例

学 院 文法学院

专业班级 行政管理 2013 级

学 号 1311830109

姓 名 汤淇皓

指导教师 南 锐

2017 年 6 月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

基于认知失调理论的官员腐败问题研究

中文题目：——以山西省“塌方式腐败”为例

英文题目：A Study on Corruption of Officials Based on Cognitive Disorder Theory
A Case Study of "Earthquake Corruption" in Shanxi Province

姓 名：汤淇皓 学 号：1311830109

学 院：文法学院

专 业：行政管理 班 级：行政管理 2013 级

指导教师：南锐 职 称：讲师

完成日期：2017 年 6 月 19 日

诚信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毕业设计（论文）是本人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的。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毕业设计（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对本文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

作者签名：_____日期：_____

关于使用授权的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有关保留、使用毕业设计（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允许论文被查阅或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

作者签名：_____导师签名：_____日期：_____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任务书

学院： 文法学院 专业： 行政管理 班级： 行政管理 2013 级

姓名： 汤淇皓 学号： 1311830109

任务下达日期： 2016 年 11 月 18 日

任务完成日期： 2017 年 6 月 19 日

论文题目： 基于认知失调理论的官员腐败问题研究——以山西省“塌方式腐败”为例

专 题 题 目：

任务主要内容：

论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绪论、论文主体和结语。

第一部分的绪论，主要介绍了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可能的创新及不足。

论文主体部分详细介绍了认知失调理论，并根据其理论框架分析了山西省“塌方式腐败”的案例。

结语部分对认知失调理论在腐败成因的理论和实践意涵上进行了总结和展望。

任务目标要求（文献阅读、外文资料翻译、设计或实验工作量，图纸、软硬件数量及技术指标等）：

严格按照论文进度进行论文的撰写，明确写作思路，认真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及时与指导老师沟通汇报。整篇论文要求布局合理，逻辑严谨、语言顺畅、格式规范，字数控制在 12000 字左右。

时间进度安排:

1. 2017 年 1 月 10 日前, 确定论文题目, 进行相关资料的收集工作;
2. 2017 年 2 月 29 日前, 下达毕业论文任务书并写出论文提纲;
3. 2017 年 4 月 20 日前, 前在导师的指导下, 学生进一步收集查找相关资料, 并开始撰写论文, 交初稿;
4. 2017 年 5 月 20 日前, 根据老师的修改意见修改论文, 上交二稿、三稿;
5. 2017 年 6 月 20 日前, 在教师的指导下, 修改论文、定稿、准备答辩, 并将论文装订上交。

推荐阅读的文献资料:

- [1] 倪星. 理性经济人视角下的官员腐败研究[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06: 3-8.
- [2] 山西“塌方式腐败”样本分析 荡涤不良政治生态[J]. 中国纪检监察, 2015, 03: 23.
- [3] 费斯汀格. 认知失调理论[M]. 郑全全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 [4] 过勇, 胡鞍钢. 行政垄断、寻租与腐败——转型经济的腐败机理分析[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3, 02: 61-69+129.
- [5] 胡伟. 政府过程[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 [6] 吴一平, 芮萌. 地区腐败、市场化与中国经济增长[J]. 管理世界, 2010, 11: 10-17+27.
- [7] 周黎安, 陶婧. 政府规模、市场化与地区腐败问题研究[J]. 经济研究, 2009, 01: 57-69.

教学院长签字:

指导教师签字:

摘 要

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成为中国政府政策议程的重要部分。反腐败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前所未有。在众多被查处的腐败案件中，山西省“塌方式腐败”成为最为典型的案例之一。认知失调理论为解析官员群体腐败提供了新的视角。基于这一理论框架，研究腐败官员在面对腐败时，其廉洁认知因素与对于腐败认知因素之间的冲突。透过山西省“塌方式腐败”的现象可以发现，官员认知失调解释了腐败行为的产生甚至不断被强化的深层原因。借助于认知失调理论提供的逻辑，详解讨论了官员集体腐败如何在四个机制下的诱导出来，即决策情境、强迫服从效应、接触信息和社会支持作用。接着，从反腐败的路径上分析改变行为使与廉洁认知一致、改变认知使与廉洁行为一致和增加新的认知元素使廉洁认知与廉洁行为相协调这三个路径，为反腐败策略的制定提供参考。最后，强调在反腐败策略制定过程中要处理好两个问题：一是如何避免认知失调持续放大，即避免陷入“越反越腐”的怪圈；二是如何加强认知系统的协调，即确保廉洁认知和廉洁行政的一致。

关键词：认知失调理论；腐败成因；反腐败；行为学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central committee, anti-corrup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policy agenda. Anti-corruption efforts, the scope of the unprecedented. Among the many cases of corruption, Shanxi Province "corrupt corrup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typical cases. Cognitive imbalance theor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analyzing corruption among officials. Based on this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e study of corrupt officials in the face of corruption, its clean cognitive factors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cognitive factors of corruption. Through the phenomenon of "corrupt corruption" in Shanxi Province, it can be found that officials' cognitive disorders explain the deep causes of corrupt behavior and even being strengthened. By means of the logic provided by the theory of cognitive impairment, the three paths of changing cognition, changing behavior and adding new cognitive elements are analyzed, which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ormulation of anti - corruption strategy. At the same time, it is emphasized that two problems should be dealt with in the process of anti-corruption strategy: one is how to avoid the continuous enlargement of cognitive disorders, that is, to avoid the "more anti-corruption" cycle; the second is how to strengthen the coordination of cognitive systems, Integrity and Integrity of Consensus.

Keywords: 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 causes of corruption; anti-corruption; corruption behavior

目 录

| | |
|---|----|
| 一、绪论..... | 1 |
| (一)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 |
| 1. 研究背景..... | 1 |
| 2. 研究意义..... | 1 |
| (二) 研究综述..... | 2 |
| 1. 国外研究综述..... | 2 |
| 2. 国内研究综述..... | 3 |
| (三) 研究设计与方法..... | 4 |
| 1. 研究设计..... | 4 |
| 2. 研究方法..... | 5 |
| 二、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6 |
| (一) 概念界定..... | 6 |
| 1. 认知失调..... | 6 |
| 2. 腐败与“塌方式”腐败..... | 6 |
| (二) 理论基础..... | 7 |
| 1. 寻租理论..... | 7 |
| 2. 委托—代理理论..... | 7 |
| 3. 认知失调理论..... | 7 |
| 三、基于认知失调理论的官员腐败行为分析——以山西省“塌方式”腐败为例..... | 9 |
| (一) 决策情境下官员腐败行为的发生机制..... | 9 |
| (二) 强迫服从效应下官员腐败行为的发生机制..... | 11 |
| (三) 接触信息对官员腐败行为的发生机制..... | 11 |
| (四) 社会支持作用下官员腐败行为的发生机制..... | 12 |
| 四、基于认识失调理论的官员反腐败路径分析..... | 14 |
| (一) 改变腐败行为，使与廉洁认知一致..... | 14 |
| (二) 改变腐败认知，使与廉洁行为一致..... | 15 |
| (三) 增加新的认知元素，使廉洁认知与廉洁行为相协调..... | 16 |
| 五、结论..... | 18 |
| 参考文献..... | 19 |
| 致 谢..... | 21 |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1. 研究背景

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力度空前。被查处的高级官员数量已超过过去十年查办高级官员数量的总和。在中共中央提出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的目标下，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对各级腐败官员进行大力整治，“苍蝇”、“老虎”一起打，成效显著。2016 年 10 月，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2015 年 10 月，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这些文件都标志着从严治党在制度层面得到进一步落实。我国的国体和政体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同时党员受到党纪和国法的双重监督和约束，且党纪严于国法。因此，从我国政治伦理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党员应具有明确的廉洁认知以及做到自觉的廉洁行政，从而具有一定杜绝腐败的能力。

围绕腐败这一话题，学术界基于政治学、经济学、公共管理等各个学科和相关理论开展了大量的研究，构建了理解腐败现象和腐败实质的众多理论。学术界普遍采用经济人假设来解释腐败的发生机制。这一假设具有很好的解释力。经济人假设认为官员会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只要官员在经过成本利益计算后发现有利可图，腐败就会发生。即使勤政廉政能够增加社会收益，但只要它带来的私人成本超过私人受益，官员就不会认真履行职责^[1]。但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对于党员来说，基于“公仆”的政治伦理，即使存在制度漏洞，大部分官员仍难以突破心理障碍，依然会自觉承担社会责任、洁身自好、廉洁从政^[2]。

2. 研究意义

腐败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随着资源配置在市场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断深化，官员易趋向于被利益所“俘获”，形成寻租空间，导致腐败。而同时，传统的政治伦理表明，官员必须把公共利益放在首位。现实中，尽管官员面对经济利益诱导时，最终也不是所有官员都会发生腐败行为的。至少大量案例表明，官员初次涉腐时往往面临明显的心理失调

状况。腐败官员在狱中忏悔时，都会提到对不起国家、社会和家庭。官员在认知上抱有极大的罪恶感和愧疚感。此时的官员并非完全的“经济人”。基于以上的分析，显然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来看，只有以官员是理性经济人为基本假定，才能真正加强制度的有效约束。但是以“经济人假设”在解释腐败行为发生机制时，存在部分失灵的可能。中国政府存在“公仆”的一面是人格化权力张力^[3]。人格化权力张力的政府治理模式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体制的鲜明特点。一方面，人格化的政府治理模式体现了效率的优势。但是另一方面，一旦人格化和制度化的政府治理模式张力破裂，领导者丧失了廉洁认知，人格化的政府治理模式的天然弊端就会暴露出来，即政策议程的建立和推动过多取决于领导者。权力的行使高度集中在领导者手中。如果领导者廉洁行政则决策效率高，政府较为清廉。反之，一旦权力滥用则腐败现象难以避免，甚至导致“劣币驱除良币”的恶性现象。

认知失调理论为解析官员腐败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即从行为学的视角来分析官员腐败产生的微观特点，注重从官员的廉洁认知和其对于腐败行为认知间的互动关系入手来审视为腐败行为。

十八大后，大量的腐败案例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更多的素材。通过对被查处高级官员的统计发现，因腐败而被查处的官员中，共产党员不在少数。2013 年，山西省“塌方式腐败”被查处的腐败官员人数之多，涉及面之广，前所未有。从省委委员到基层干部，出现“一查就是一帮，一动就塌方”的系统性腐败。那么困扰我们的问题是，山西省“塌方式腐败”的现象是山西官员集体在理性计算后才形成的吗？许多因腐败被查处的官员为什么在明知违法党纪国法高压线的情况下，仍然会铤而走险？官员腐败行为一旦产生将会是一个持续的行为吗？回答这些问题，对于理解我国的腐败成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综述

1. 国外研究综述

自现代国家肇始以来，政治理论家与思想家反复讨论并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就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因此，分权下的政党政治是现代国家的基石。比如美国联邦党人麦迪逊就指出“依靠人民是对政府的主要控制”^[4]。美国也是践行和实践三权分立的典范国家。

Becker 和 Stigler^[5]在其开创性的文献中指出，腐败个体追求的是自身效用最大化并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经济人。之后的腐败研究文献延续了 Becker 和 Stigler 的思路。随着计量方法在腐败问题研究中的大量运用，西方学者进行了大量的实证检验。采用的指标包括，教育、人口规模、性别、政治影响因素（民主与否、分权集权、政党数量等）、经济影响因素（政府支出、经济自由度、贸易自由度、国外直接投资等）、社会文化影响因素（宗教、民族差异、自然资源、殖民地历史等）。比如 Treisman 通过加权最小二乘检验了全球范围内不同国家的成因^[6]。他发现更经济发达的、更多进口的、有新教传统的国家有更少的腐败可能性。联邦制国家有更多的腐败。而是否是民主体制对腐败的影响并不显著，但长期的民主体制可预期更低的腐败程度。Fisman 则检验了财政分权与腐败的关系。他发现财政分权程度越强，政府腐败的可能性越低。这些研究为我们勾勒了影响腐败的可能因素^[7]。

除了传统的政治思想理论、现代主流的计量检验方法，由透明国际组织（TI）开发的清廉指数（CPI）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全球国家及地区进行腐败程度的测量及排名。

2. 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关于腐败问题的研究从 2000 年后方兴未艾的发展起来。从权力制约与监督的视角，组织中的第一把手是能否发生集体腐败的关键^[8]。在现行的行政体制下，一把手的权力过分集中，导致“重行政问责，轻政治问责”，“又缺乏相应的退出机制，问责惩戒力度不足”的现象^[9]。

从成本收益的视角，腐败的客观基础是公共决策与决策者私人利益的矛盾^[10]。胡鞍钢和过勇^[11]进一步比较了我国公务员的即期收入和预期收入等影响成本收益的影响因素。

国内学者进一步对腐败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主要从财政分权和政府规模的视角切入来检验与腐败的关系^[12]。吴一平较早的进行了腐败成因的实证研究，他利用 1993—2001 年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财政分权对腐败的影响，发现财政分权与腐败呈负相关。潘春阳等^[13]通过对 1999—2007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进一步发现，在控制了政府规模和支出结构下，财政分权能抑制该地区腐败水平。这与周黎安^[14]的研究相印证。他利用 1989—2004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发现政府规模与腐败呈正相关。因此，根据已有的实证结果表明政府规模扩大、财政分权扩大会提高该地区的腐败水平。但在地区政府规模相对平稳的情况下，财政分权能够抑制腐败程度。

大部分学者检验的是中国省级层面的腐败成因。倪星，陈姗姗^[15]则利用 2000-2010 年的对 15 个副省级城市的腐败程度进行检验，发现在副省级城市层面上，政府人员规模与腐败水平呈 U 型曲线关系、市委书记任期越长会加重腐败程度。各个学者的实证研究均发现，政府人员的效率工资提升能有效的抑制腐败程度。

但是，现有的实证研究很难回应 1997 年由于中国分税制改革形成的“财政联邦制”和由于“中国政治周期”导致领导人更替所带来的结构性变化。吴一平^[16]考虑到了 1997 年中国分税制改革对我国央地关系的结构性变动。他以 1997 年为界，划分了 1989—1997、1998—2006 两个时间段，发现法制建设、财政分权和预算外制度性解释了腐败程度的下降。

实证研究深入的同时，一些学者开始从思想伦理的角度对腐败问题进行解释，其中不仅包括中国特有的“关系”、“插叙格局”等历史文化因素，也包括了利益冲突等行政伦理理论。一些学者尝试从行为学的角度来解释官员腐败。比如，张增田基于“有限理性人”的前景理论，认为腐败行为源于官员的“风险追求”^[17]。感知的腐败可控感越高，初始腐败程度越大，之后的腐败发展趋势也越快^[18]。也有学者从人情的角度分析腐败行为的产生，认为腐败行为是“人情往来”的过程^[19]。还有学者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官员腐败行为，认为潜规则的盛行、信任感的缺失导致制度反腐与文化反腐出现了内在的不协调^[20]。以上这些理论对于解释腐败行为提供了更多的研究视角，却忽视了认知失调理论在解释官员腐败行为发生机制方面的重要理论意涵。

（三）研究设计与方法

1. 研究设计

本文的框架大致可以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这部分对腐败问题的研究背景、研究方法及其意义进行了简单介绍，并指出了现有研究的可能不足及本文的可能创新点。论文第二部分介绍了认知失调理论，并根据其理论框架分析了山西省“塌方式腐败”的案例，详细的阐述了基于认知失调理论下官员腐败行为的四个发生机制，即决策情境下、强迫服从效应下、接触信息和社会支持作用下官员腐败行为的发生机制，并对反腐败策略进行了分析。结论部分对认知失调理论在腐败成因的理论和实践意涵上进行了总结和展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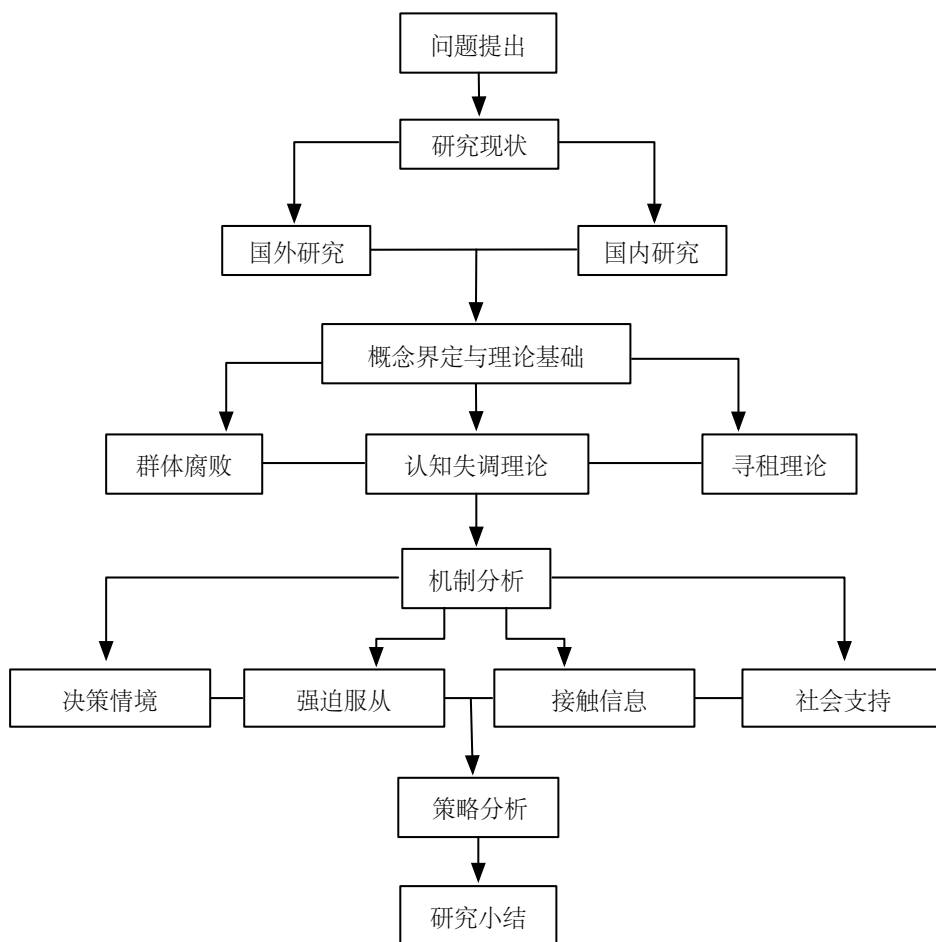


图1 研究设计图

2.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以下两个研究方法。

一、文献研究法。通过梳理国内外文献研究，从而发现国外对于腐败的研究开始时间早，研究更为深入。国内的腐败研究起步较晚，不论是在理论视角的选择还是研究方法上等都需要进一步的加强。但已有文献忽视了心理学理论在腐败问题研究中的应用。

二、案例研究法。山西省“塌方式”的案例在中国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典型意义。本文从认知失调的视角切入，将理论与案例相结合。通过理论剖析山西省“塌方式”腐败案例发生的内在机制。

本文以中国共产党员具有廉洁认知为假设前提，把认知失调界定为官员的廉洁认知和腐败行为认知之间的失调，并基于认知失调理论，为理解腐败行为的发生机制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框架。

二、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一）概念界定

1. 认知失调

认知失调理论^[21] (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 由美国心理学家费斯汀格 (Leon Festinger) 提出, 并广泛应用于心理学研究。官员的腐败行为是一种消极行为, 且具有极强的隐秘性、复杂性。通过认知失调理论的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廉洁认知与腐败认知的转变过程, 从而为更深入的理解官员腐败行为的发生机制提供一个视角。因此, 把认知失调理论引入到分析官员腐败行为是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认知失调理论认为, 当个体发觉自己所持有的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认知、行为或环境元素相矛盾时, 便会出现认知失调, 内心会有不愉快和紧张的感觉, 产生一种驱使个体解除这种不协调的动机。个体追求内在一致性, 即认知和行为的一致性。

2. 腐败与“塌方式”腐败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于腐败的基本定义就是公权私用。因此, 腐败不仅存在于公共部门, 同样也存在于私人部门。本文仅讨论公共部门, 即政府中的腐败问题。杨继亮认为, 腐败就是执政者 (在政党社会就是执政党的成员) 由于受到腐化思想所支配, 凭借执政的权力, 从事与执政者的宗旨背道而驰的行为, 以权谋私, 坑国害民, 损人利己, 并由此而导致社会风气的败坏^[22]。

从政府涉及腐败人数看, 我们可以将腐败分为个体腐败和群体腐败。显然, 个人腐败的原因更多是基于理性人对于租金的追求, 是基于成本收益的合算。从全球范围看,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实现绝对的廉洁, 完全没有任何腐败。个体腐败更为隐秘, 并且难以避免。群体腐败的发生机制则有别于个体腐败。本文所讨论的“塌方式”腐败则是群体腐败中的一种。

（二）理论基础

1. 寻租理论

“租”原意指的是一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凭借垄断地位而获得的收入中，超过该要素的机会成本的剩余。因此，寻租实质上会导致市场机制的扭曲。寻租会产生挤出效应，削弱创新机会、企业家精神，造成大量的社会无谓损失。寻租理论的视角下，腐败的发生取决于贿金、惩罚以及被发现的概率这三个因素。这是由于中国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市场和政府的合谋为政府提供了更多的腐败供给和对腐败更强的需求^[23]。中国特有的腐败形式——行政垄断，它来源于政府的主动创租行为^[24]。

2. 委托—代理理论

在现代国家的治理中，由于国家的“主人”——人民，不可能实际上亲自并参与所有的政策、决策等制定，而是将这一权利以委托的形式交给政府。从而出现了委托代理关系及其理论。在委托代理理论下，委托人即官员的行为受到以下四个特点的影响。一是信息的不完备性。二是个人选择的不确定性。三是选择结果的强制性。四是损益的公共性。基于这些特点，汪丁丁^[25]讨论了官员在“均衡行为模式”下，哪些因素决定了公众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边际转换比率。由于信息不对称与合约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容易诱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26]。

3. 认知失调理论

认知失调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决策的情境。决策中的认知失调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决定的重要性。一般来说，决定重要性越强，失调产生的可能性越小。二是未选中备选物的相对吸引力。相对吸引力越大，失调程度越高。三是所涉及备选物的认知重叠程度。认知重叠越大，做出选择后产生的失调就越小。（2）强迫服从的效应。强迫服从指的是施加于一个人身上的，要其改变观点、信念或行动的影响或压力。强迫服从会导致改变内心的观点，使之与外在行为协调。或者通过增强奖励或惩罚的程度，从而增加与外在服从行为的协调程度。（3）主动和被动接触信息。由于行为者的一些被动行为从

而使他受到了新信息的影响，一旦行动者进一步了解信息，这些新信息会增加他的失调程度。如果一个人被动接触信息会发生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偶然接触。如果不存在失调，不大会去避免新信息。如果增加了失调，可能会小心翼翼的行动。二是在无关基础上的接触。某些原因接触了潜在的认知源，因此感到不舒服。三是强迫接触。四是与他人的交往。听取了他人的观点。（4）社会支持的作用。社会群体是个体认知失调的主要来源，也是消除和减少可能存在失调的主要来源。一个观点所涉及的协调关系数目越多，由意见分歧所产生的失调程度就越小，协调数目是指这种关系所涉及到元素的重要性的加权总和。当持不同意见的人或群体与这个观点越是有关，相应于其他人意见的认知元素就越重要，产生失调越大。如果那个人是专家，失调就会更大。

三、基于认知失调理论的官员腐败行为分析——以山西省“塌方式”腐败为例

“塌方式腐败”指的是十八大以来，山西省出现的大量腐败案件，涉及官员人数众多，被查处省部级官员数量更是史无前例。一共 7 名省部级干部落马，其中包括 4 名省委常委。至少 18 名前任和现任县委书记落马^[27]。因此，“塌方式腐败”的典型案例通常指的就是十八大后山西省性质恶劣的群体腐败。行为学视角下“塌方式腐败”的形成是一个认知走向失调的过程。以下本文从认识失调理论的四个应用情境来分析山西省“塌方式腐败”中官员腐败行为的发生机制。

表 1 十八大以来山西省省级官员被查处统计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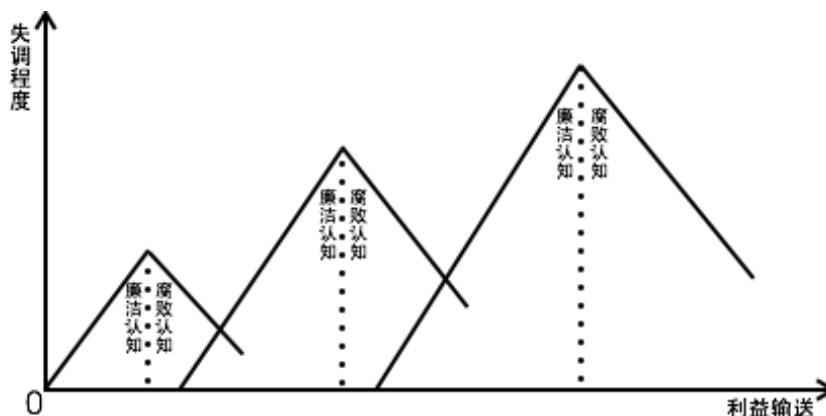
| 序号 | 姓名 | 报道时间 | 原任职位 | 所涉问题 | 处理情况 |
|----|---------|------------|---------------|----------|-----------|
| 1 | 金道铭 | 2014.02.27 |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 严重违法违纪 | 双开、移送司法 |
| 2 | 杜善学 | 2014.06.19 | 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 | 涉嫌严重违法违纪 | 开除党籍、移送司法 |
| 3 | 令政策 | 2014.06.19 | 山西省政协副主席 | 涉嫌严重违法违纪 | 组织调查 |
| 4 | 聂春玉 | 2014.08.23 | 山西省委常委、秘书长 | 严重违法违纪 | 双开、移送司法 |
| 5 | 陈川平 | 2014.08.23 | 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 | 严重违法违纪 | 双开、移送司法 |
| 6 | 白云（女） | 2014.08.29 | 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 严重违法违纪 | 双开、移送司法 |
| 7 | 任润厚（已逝） | 2014.08.29 | 山西省委副省长 | 严重违法违纪 | 双开、移送司法 |

说明：报道时间为中纪委公布时间

（一）决策情境下官员腐败行为的发生机制

山西是煤炭大省，煤炭资源丰富。十八大后，能源领域是腐败的重灾区，同时也是中纪委重点查办的领域。我们可以假设一种收受贿赂的情况：在矿山开采权的批准上，在选择一个开采效率和各项条件较好的企业 A 和一个与之相比条件较差的企业 B 时，正常情况下，决策官员 C 会选企业 A。但此时企业 B 给决策官员 C 提供 100 万元人民币的贿赂。如果此时面对 100 万元人民币，官员 C 的失调很小，那腐败行为很难产生。因为在官员 C 看来，廉洁认知指导其廉洁行政的一致，且有党纪国法的监督，必然会自觉的拒绝贿赂。但同时，官员也可能产生廉洁认知和可能产生腐败行为的不一致，即官员的廉洁认知在

面对可能的腐败机会时产生了失调。如果在决策官员 C 看来，100 万人民币和开采权的分配相比，100 万元对于他来说更为成本收益更大，那么腐败行为就很可能发生。



注：曲线从左到右分别表示决策的重要程度

图3 强迫服从效应的认知失调函数

我们这里有必要进一步讨论这样的一种情况：如果当利益输送太小的时候，不能引发腐败的服从行为，即贿赂金额不足以引发官员腐败行为。根据认知失调理论，一方面，如果利益输送恰恰不足以引发服从行为，那么官员所产生的失调将达到最大程度。或者说利益输送越小，廉洁认知与廉洁行为失调也越小，官员往往不会被贿赂方的利益输送所“打动”。另一方面，而当利益激励不足以引发外在服从行为时，朝对立方向改变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会有助于减少失调。即说服对象会寻找更多论据支持他的最初立场，那么协调的关系数目会增加，于是整个失调会减少。也就是说，官员会找出更多支持其坚守廉洁认知的依据，为减少廉洁认知和潜在腐败行为所带来的失调，会选择拒绝利益输送，抵制腐败行为的产生。

图3 清楚的描述了官员在面对利益输送时强迫服从的函数。横轴表示利益输送，纵轴表示廉洁认知与潜在腐败行为的失调程度。从左到右的曲线分别表示该决策事件在官员认知中的重要程度依次递增。从图一中可以发现，当利益输送的量越大时，在官员认知中重要程度越大的曲线，失调程度的最大值也越大。当取到失调程度的最大值后，失调程度便会下降。这说明此时官员的廉洁认知明显下降，为与腐败行为的认知保持协调。官员会转变廉洁认知，树立起腐败的认知。

假说 1：决策本身越重要，认识失调的程度越强。

假说 2：决策所获的收益越比成本高，认识失调的程度越强。

假说 3：决策本身的偏好程度越大，认识失调程度的越强。

（二）强迫服从效应下官员腐败行为的发生机制

强迫服从的失调我们仍采用这样的前提假设：腐败的官员并不是“见钱眼开”，不是完全的经济理性人。至少在认知上，官员有明确的廉洁认知，会顾及到收受贿赂是犯罪行为。因此，官员会产生失调。当贿金恰好不足以引发腐败行为时，官员的失调会达到最大。但此时的失调是有利于遏制官员产生腐败行为的。当失调程度超过最大值逐步下降时，此时官员原先秉持的廉洁理念就会改变，失调逐步消失。官员在强迫服从中会被腐败文化所腐蚀，从而会认为腐败是常态。

贿赂人员往往会通过增强官员所获得“好处”的重要性，增加受贿人员协调性元素的数目促成官员突破廉洁认知失调的最大值，转变官员对廉洁的认知，从而接受利益输送。这就要求，例如加强反腐败立法和执法刚性，即增加官员认知失调的最大值。例如，官员在收受贿赂时会考虑到法律的严苛和党纪的约束，或者将来仕途和升迁，与所受贿赂相比，保持廉洁显得更为重要。因此，通过降低收受贿赂行为的重要性，可以减少失调。

一旦强迫服从效应发生后，官员原有的廉洁认知转而新的腐败认知。官员不会主动再增加自身的失调，因此，腐败认知很难再转向廉洁的认知。这也回答了为什么“腐败行为一旦产生必然是一个持续性的行为”。原因就在于当强迫服从效应后，官员的廉洁认知已经转向腐败认知，腐败认知则会指导其持续性的腐败行为。

假说 4：上级的命令要求越明确，认识失调的程度越强。

假说 5：官员获得的收益越大，认识失调的程度越强。

（三）接触信息对官员腐败行为的发生机制

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道德风险。腐败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信息的不对称。更多的研究表明，官员是否腐败的决定性因素是官员能否被查处的风险大小。尤其在那些权力制约与监督制度不完善的国家，存在着大量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形成权力真空，为腐败行为隐藏，提供

了腐败的制度可能和腐败机会，进一步导致逆向选择。根据中共中央纪委拍摄的专题片《永远在路上》中透露，山西省腐败现象潜伏期久、范围广。“跑官买官”、“带病提拔”的现象十分普遍。而直到十八大后中央巡视组进驻山西后，那些仍担任要职的官员才得以被查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山西省内信息的不对称为山西省“塌方式”腐败提供了土壤与极为负面的信号作用。官员几乎身处于腐败的信息池塘中。在这样腐败的政治生态中，诱导出了大量的腐败行为。

假说 6：越是主动接触反腐败信息，认识失调的程度越强。

假说 7：自身接触的腐败行为频率越高，认识失调的程度越强。

假说 8：越是被动接触反腐败信息，认识失调的程度越弱。

（四）社会支持作用下官员腐败行为的发生机制

透过山西官场塌方式腐败的现象，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大部分山西官场的官员具有相同的廉洁认知与腐败行为失调。官员的廉洁认知和身边大量的腐败行为产生了认识失调。尽管多数官员依然能够秉持廉洁认知，并且遵守法律和党纪的监督。但是在认知行为的失调过程中，那些廉洁认知较为薄弱的官员，就会选择改变廉洁认知，实现腐败认知和腐败行为相一致的方式来减少和避免失调，即一开始是一小部分的腐败个体，迅速蔓延成群体腐败。在腐败程度加深的过程中，不同官员的失调程度又是不同的。也就是说，一部分官员可能从一开始的小心翼翼，发展到大肆收受贿赂等各种手段和方式。这一部分官员在减少廉洁认知和可能腐败行为的失调时，会寻求社会支持。当较为“谨慎”和“胆小”的官员受到腐败群体的支持后，逐渐放弃对廉洁认知的坚守，同样会树立起腐败的认知。因此，腐败的雪球就越滚越大，所涉及的官员人数越来越多。另外一部分官员本就无所顾忌，廉洁认知、法制意识淡薄。这部分官员自身失调程度较低或者说根本不存在失调的情况，腐败行为也更为大胆和明显。那么，如果失调程度能够得以及时控制，失调程度较高的官员腐败行为就不会更不受制度约束。塌方式腐败的蔓延也不可能影响范围如此之广、涉及面如此之大。

假说 9：上级的廉洁程度越高，认识失调的程度越高。

假说 10：所在单位的整体廉洁程度越高，认识失调的程度越高。

假说 11：同事的廉洁程度越高，认识失调的程度越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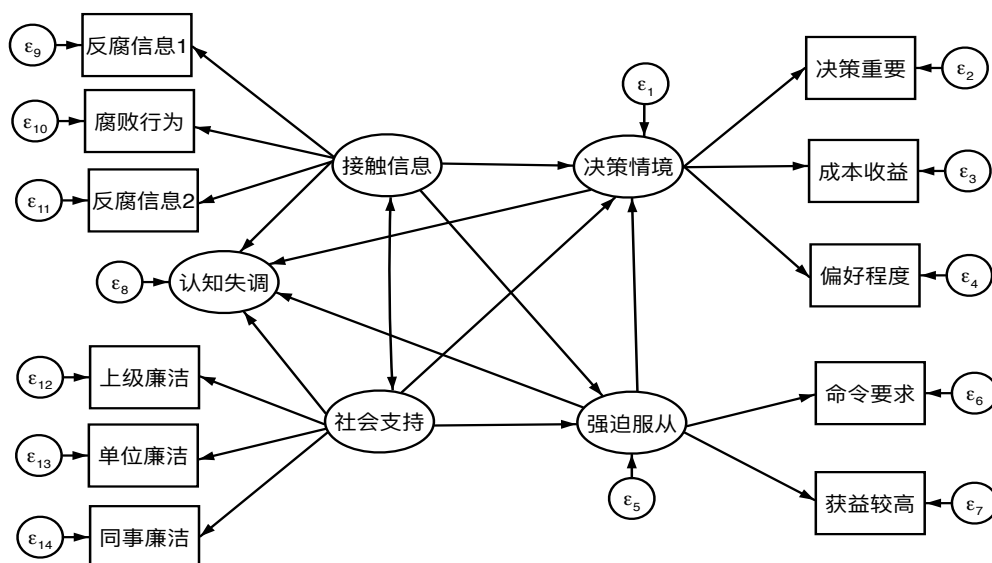


图 4 认知失调理论在结构方程模型中的应用

基于以上的四个机制和假说，我们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将腐败行为的四个机制整合在一起。其中决策情景包括官员对决策本身重要性的认知、成本收益的比较以及官员个人偏好。强迫服从包括上级官员的命令要求和是否获得高的收益。接触信息包括被动接触腐败信息的频率、接触到腐败行为的频率和主动了解反腐败信息的频率。社会支持则包括上级的廉洁程度、单位的廉洁程度和同事的廉洁程度。但是，对于结构方程模型的有效性有赖于研究进一步的深入和数据的收集。

四、基于认识失调理论的官员反腐败路径分析

认知失调理论下，我们可以对官员腐败行为进行以下的分析。首先，官员可以改变自己的行为。在面对可能产生腐败行为时，可以选择避免腐败，拒绝腐败发生。但是利益驱使下和效益计算后，官员可能倾向于选择腐败。其次，官员可能认为腐败行为违反了法律、党纪，但是比起被判刑事处罚，腐败行为的成本很低。再次，官员开始改变自己的态度。转而认为腐败行为并没有什么大不了。最后，寻找增加新的认知元素，加强认知系统的协调。比如官员认为比起自己对国家带来的贡献，自己的腐败行为不会构成很大危害。因此，腐败行为产生。基于此，该理论对于降低失调程度提供了三个分析路径，一是改变腐败行为，使符合廉洁认知。二是改变腐败认知，使符合廉洁行为。三是增加新的认知元素，加强廉洁认知与廉洁行为系统的协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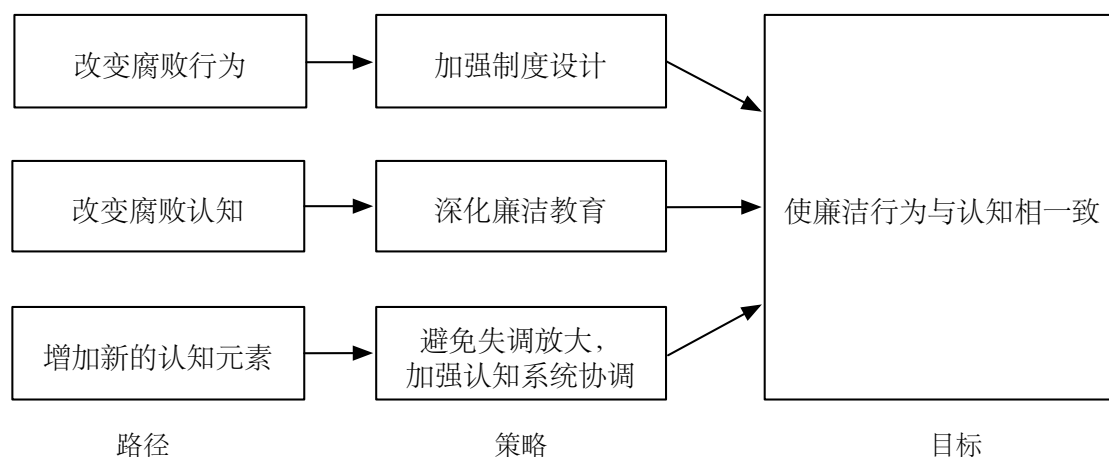


图 5 基于认识失调理论的官员腐败路径分析示意图

（一）改变腐败行为，使与廉洁认知一致

改变腐败行为的重点在于加强制度设计。改变腐败行为一部分体现在国家监察机关对官员腐败行为的执纪追责，是对官员腐败行为的直接打击。另一部分体现在反腐败制度的不断完善，是对可能腐败的间接限制。认识失调理论表明，个体对于改变已有的行为会产生抵制。一是改变可能是痛苦的或会造成损失的。二是目前的行为可能在其他方面是令人满意的。三是进行改变是不可能的。以上三个方面抵制改变腐败行为的认知元素阻碍了腐败行为的改正。也就是说，对于已经涉及腐败的官员要使其自身改变腐败认知和腐败行为

的可能性极小。如果没有外界强制性、高压性的措施逼迫，官员腐败很难得到制止。

当腐败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被依法查办时，一方面，对于已经发生腐败行为但仍未被查办的官员，他们会去主动的了解反腐败的相关信息和规定。因为，那些涉及腐败的官员对自己的腐败行为是有所判断的，在接触到查办案件的信息时，会产生失调，即如果继续腐败和是否该收手存在失调。所以已经涉及腐败的官员会通过追求信息减少失调。对这部分官员来说，他们会通过改变腐败行为与所获取的反腐败信息保持一致。另一方面，对于尚未发生腐败行为或者对腐败仍抱有一丝幻想的官员来说，接触到查处腐败官员的信息时，他们也会主动追求这些新信息。因为在强力打击腐败的社会中，官员会逐渐对腐败行为产生排斥，至少会主动的避免腐败，从而逐步产生廉洁从政的认知。同时对于官员而言，对哪些行为属于是腐败行为缺乏一定的认知，官员反而会更加主动的了解反腐败政策的相关规定，以减少认知失调，使廉洁行为和廉洁认知相协调。

事中监督与反腐败实际效果的相关性最强。事后惩罚与反腐败实际效果的相关性属于中等水平。这也说明了十八大后强力打击腐败能取得让官员较快收敛、杜绝腐败行为的效果，是直接改变腐败行为，使官员逐步树立和符合廉洁认知的有效策略。但从长期的眼光来看，加强制度约束仍是反腐败策略的核心命题。

（二）改变腐败认知，使与廉洁行为一致

首先，改变腐败行为的重点则在于深化廉洁教育。廉洁教育从树立官员的廉洁认知入手，使之形成廉洁认知甚至能够改变腐败认知，指导其廉洁行政。如果不具有明确的廉洁认知，官员在面对腐败机会时认知失调也不会存在，那么腐败行为就极易产生。大量的案例表明，高学历并不意味着较高程度的廉洁认知。因此，廉洁教育对于官员减少腐败行为具有重要作用，提倡廉洁的理念是官员形成廉洁从政价值观的基础。思想教育与反腐败实际效果之间存在中等强度的相关性。比如，定期开展党风廉政座谈会、民主生活会可以将偶尔接触廉洁信息变为在学习廉洁知识的过程中，接受廉洁理念，增强廉洁认知。这就要求党风廉政座谈会、民主生活会等多样的廉洁教育方式不能走形式主义，而是要切实将廉洁的意识深入到每个官员的头脑中，使其深刻领会“腐败是政治之癌”，其严重的后果会造成“亡党亡国”。

其次，领导者注重廉洁建设是最有力的廉洁理念的宣教方式。在实行单一制的中国,反腐败更需要廉政领导力,廉政领导力更有用武之地^[28]。在官僚制的政府机构中，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层级节制，领导者具有因其职位而赋予的绝对权威。同时领导往往也是组织中最瞩目的对象。在组织中，人们会主动去接触领导者的相关信息。通过领导者展现出来的廉政领导力具有强大的示范作用，比起被动的接触廉洁信息来的更加易于人们所接受。

（三）增加新的认知元素，使廉洁认知与廉洁行为相协调

由于腐败行为具有极大的隐秘性，很难做到腐败行为即将发生时，再增加新的认知元素来遏制腐败行为。因此，增加新的认知元素应当存在于日常的行政事务中。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官员的头脑中加入“第三种信念”，使官员秉持廉洁认知，从而远离腐败行为，让廉洁理念和廉洁从政的认知与行为相协调。

首先，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在增加新的廉洁认知元素的过程中，如何避免增加廉洁认知与腐败行为的认知失调。当新的廉洁认知元素不仅没有减少失调，反而增加失调时，官员的廉洁认知就极有可能发生转变，即从秉持程度较高的廉洁认知转变到腐败认知。正如在强迫服从的效应中，当失调程度达到最大值时，随着利益输送的量增加，失调转而下降。这里的下降是我们不想看到的，因为此时廉洁的认知已经式微，为了追求腐败行为的协调，官员反而会逐渐树立“腐败没什么大不了”的认知。如此一来，不仅没有让廉洁的理念与廉洁行为相协调，反而促使腐败的认知与腐败行为相协调。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如何增加新的认知元素的问题应该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如何避免扩大认知失调。二是如何加强认知系统的协调。显然，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前者是避免官员在认知上将其腐败行为的合理化。后者能为官员加强廉洁的认知，促使其廉洁认知与行为相互协调。

其次，在追求认知协调的过程中，人们往往会在改变行为认知和改变环境认知这两个方面产生抵制。如果没有认知元素的抵制，那么失调就会逐渐消失。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官员能够克服改变行为认知和环境认知元素的抵制。现实中，官员个人试图降低失调，即选择拒绝腐败，使廉洁认知与廉洁行为相协调。而最终在腐败行为发生时，往往官员自身处在失调程度较高的状态中，而试图减少腐败行为的认知又遭到新的认知元素的掣肘。根据

认知失调理论，除了前文提到的对于改变行为抵制的三个方面之外，人们对改变环境的认知元素同样会产生抵制，体现在一个元素与一系列其他元素有联系。因为这个元素与许多其他元素处于协调之中，也因为改变它会使失调代替协调。所以该元素将会抵制改变。换句话说，当一个地区腐败现象频发时，当地官员谋求一人的独善其身是十分困难的。新的认知元素并没有减少认识失调程度，反而加强了认知失调。本来坚守廉洁认知的官员增加失调后，致使官员突破廉洁认知的底线，以至沦为其中堕落腐化。因此，反腐败策略的执行过程中，要避免认知失调的持续放大，即避免陷入“越反越腐”的怪圈。

最后，当从增加新的认知元素这一路径下制定反腐败策略时，结合前文改变态度和改变行为的路径基础之上，需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应注重如何避免认知失调的持续放大。比如，各级反腐败机构应继续坚持“有贪必反，有腐必惩”。对于负责的领导干部更应加强监督，落实行政首长负责制。保持并加强上级国家机关对下级机关的监督。让腐败官员真正得到惩处，不放过任何一个腐败分子。二是如何加强认知系统的协调，营造廉洁社会的氛围。一方面是对官员腐败的坚决打击。另一方面，应在全社会范围内弘扬廉洁理念，同时不断加强制度机制的约束、大众传媒的监督、社会公众的参与、法律法规的制定等。认知失调理论表明，大众传媒在人们并不大讨论的话题方面更能发挥影响力。腐败行为具有隐秘性的特点，如果没有“第四部门”对于反腐败的报道，人们不会过多的谈及腐败和廉洁相关的话题，也不利于新闻媒体、社会公众发挥监督作用。在“互联网+”的时代，官员身处信息社会，应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的监督作用，突出增加新的认知元素这一路径的作用。

五、结论

本文基于认知失调理论描述并解释了官员在面对腐败机会时廉洁认知失调的心理和行为转变过程，并指出持续的认知失调导致了官员的廉洁认知向腐败认知的转向。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员自身对于廉洁的认知本应指导其避免腐败。

一方面，本文并没有对官员的经济理性进行否定，而是提出基于认知失调理论的官员腐败发生机制，尝试对经济理性下的腐败行为发生机制予以补充。如果考虑到人性对于善的追求、对廉洁价值的坚守时，面对利益诱导并不是所有官员都会被腐化的，我们要避免绝对化和过于简化。现实中官员腐败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更多涉腐官员是在失调状态下犹豫、纠结，而非“一往无前”地投身腐败的。可以说，官员面临的心理失调既是导致腐败的诱因，也是防止和控制腐败的机会所在，毕竟心理失调意味着党性和良知的存在并持续影响当事人的动机。

另一方面，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易导致绝对的腐败。在缺乏外部有力的权力监督和内部有效的权力制约时，官员会产生廉洁认知和腐败行为的普遍失调。不得不承认的是，即使具有廉洁认知的官员在受到强迫服从的效用、社会支持的作用等影响下，腐败行为也极易被引导产生，从而走向腐败的深渊。

本文认为，认知失调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权力失范，是制度设计的问题。当然，认知失调理论没有能力回答如何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但是该理论从行为学的角度表明了官员廉洁认知对于指导其廉洁行政一致性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 倪星. 理性经济人视角下的官员腐败研究[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06: 3-8.
- [2] 倪星. 中国廉政方略变迁及其效果分析[J]. 政治学研究, 2011, 05: 74-86.
- [3] 胡伟. 政府过程[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 [4] 汉密尔顿等. 联邦党人文集[M]. 程逢如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5.
- [5] Becker Gray S. and George J. Stigler. Law Enforcement Malfeasance and the Compensation of Enforcer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4, 98(3): 371-400
- [6] Treisman D. The Causes of Corruption: A Cross-national Study,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0, 76(3), 399—457.
- [7] Fisman, R. and Gatti, R. 2002, Decentralization and Corruption: Evidence across Countrie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3(3), 325—345.
- [8] 傅江景. 集体腐败的博弈分析[J]. 经济研究, 2000, 12: 36-42.
- [9] 陈国权等. 权力制约监督论[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
- [10] 郑利平. 腐败成因的经济理性与预期效用的论析[J]. 中国社会科学, 2001, 01: 91-99+207.
- [11] 胡鞍钢, 过勇. 公务员腐败成本—收益的经济学分析[A]. 国情报告第五卷 2002 年(上) [C]: 2012.
- [12] 吴一平. 财政分权、腐败与治理[J]. 经济学(季刊), 2008, 03: 1045-1060.
- [13] 潘春阳, 何立新, 袁从帅. 财政分权与官员腐败——基于 1999-2007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当代财经, 2011, 03: 38-46.
- [14] 周黎安, 陶靖. 政府规模、市场化与地区腐败问题研究[J]. 经济研究, 2009, 01: 57-69.
- [15] 倪星, 陈珊珊. 经济结构、制度安排与地区腐败——基于副省级城市 2000—2010 年的数据分析[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06: 138-150.
- [16] 吴一平, 芮萌. 地区腐败、市场化与中国经济增长[J]. 管理世界, 2010, 11: 10-17+27.
- [17] 张增田等. 基于前景理论的腐败行为分析与反腐对策[J]. 行政论坛, 2008, 04: 26-29.
- [18] 魏子晗, 詹雪梅, 孙晓敏. 腐败行为的发展轨迹: 一项潜变量混合增长模型研究[J]. 心理科学, 2015, 06: 1459-1465.
- [19] 柯珠军, 岳磊. 人情视角下我国腐败行为的文化透视[J]. 开放时代, 2014, 02: 210-223+10.
- [20] 岳磊. 博弈论视角下腐败行为的社会学分析[J]. 理论月刊, 2012, 11: 151-154.
- [21] 费斯汀格. 认知失调理论[M]. 郑全全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 [22] 杨继亮. 腐败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 [23] 盛宇明. 腐败的经济学分析[J]. 经济研究, 2000, 05: 52-59.
- [24] 过勇, 胡鞍钢. 行政垄断、寻租与腐败——转型经济的腐败机理分析[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3, 02: 61-69+129.

- [25] 汪丁丁. 关于腐败的经济学分析[J]. 战略与管理, 2000, 06:112-115.
- [26] 倪星. 公共权力委托—代理视角下的官员腐败研究[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06:148-157.
- [27] 山西“塌方式腐败”样本分析 荡涤不良政治生态[J]. 中国纪检监察, 2015, 03:23.
- [28] 杜治洲. 廉政领导力建设:未来我国反腐败的重要抓手[J]. 理论视野, 2013, 10:43-45+60.

致 谢

又是人间六月天，本科阶段正从指间划过。而我也将短暂告别朝夕四年的帝都。

不认识自己，无法认识世界。北京恰是一个能寻找自我同时也迷失自我的城。不过此时此刻，回望四年，却满是感动、感谢、感恩。

专业学习上，我要感谢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全体行管系老师，魏毅敏、谭爽、赛明明、朱雪宁、欧阳帆、南锐、许文文、杨璐璐、郑旭涛、梁洁老师给予的莫大帮助和支持。尤其是本科导师刘金程老师，刘老师不仅是专业上的良师、更是生活中的益友。刘老师不论在学术还是为人处事上都给我做出了表率，令我受益终身。南锐老师在我出国交换期间反复与我确认论文内容并耐心督促我论文的修改并提出改进意见。我能一直保持对公共管理的兴趣是与我们系老师长期的理解和支持分不开的。每当下课我抛出一些极不成熟的小问题时，老师们都十分耐心的讲解，让我始终保持着一颗好奇心。这也激励着我直到大二时有幸获得国家奖学金与在保研期间参加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和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夏令营并皆获录取资格，以及大四下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赴美国交换学习一学期。

本科阶段我与廉洁这一主题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是学校廉洁社团的负责人，并代表我校参加在西安交通大学和中山大学举办的廉洁领袖夏令营。期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任建明老师、杜治洲老师、湖南大学的袁柏顺老师、透明国际的廖燃专员、北京科技大学的宋伟老师、中山大学的倪星老师、西安交通大学的李景平老师、北京大学的庄德水老师等对于我国廉洁事业的信心、耐心、恒心让我颇受鼓舞和感动，也直接促成了我选择反腐败主题的毕业论文选题。

在北京就读期间，我还得到了以下老师的指导和指点。清华大学公管学院的程文浩、蒙克老师，清华大学社科学院的景跃进、孟天广老师，北京大学政管学院的刘霖老师，北京大学国发院的张丹丹、黄卓老师，中国人民大学公管的杨开峰、马亮老师，浙江大学的郁建兴老师，香港理工大学的湛学勇老师，复旦大学的包刚升老师等等。老师们的言传身教让我对公共管理学科有了近一步的认识。

我还想感谢四年来朝夕相处的郭涵、黎冬霞老师、13 级全体行管班同学，行管系的学

长学姐们以及所有遇见的老师和同学们，在无数个遭遇挫折和迷惘的时候给予我不竭的向上动力。

本科期间，我利用假期走过武汉、上海、银川、呼和浩特、哈尔滨、长春、大连、青岛、泰山、秦皇岛、天津、西安、长沙、台湾、广州、深圳、香港、澳门、南京。我看到的是一个逐渐富强的中国。美国交换时，我去到 Austin, Houston, Dallas, Heifer Ranch, Florida, 看到的是一个发达的美国。我相信有一天中国也能真正的“赶英超美”。

最后，我要感谢父母一直以来对我无私的爱和奉献。父母也曾在我就期间专门来北京看望我。古时常讲父母在，不远游。好在有微信和高铁，不论是我在北京还是在美国期间，都能随时与父母取得联系。

一个学习阶段的结束只是意味着一个学习历程的开启。行文至此，再次感谢所经历的一切。

汤淇皓

Huntsville, TX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图书馆

二零一七年六月于北京